

## 現代中國的建構： 蔣介石及其《中國之命運》

陳進金

### 摘 要

1943年3月10日，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曾在國內外造成極大的影響。4個月之後，毛澤東親自組織了一場批判行動，把《中國之命運》視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傳書」，並攻擊蔣介石是「中國的法西斯」。事實上，中共對蔣介石及其《中國之命運》的批評是屬於「政治話語」，並不完全是「歷史事實」。本文將《中國之命運》一書放在蔣介石建構現代中國的脈絡中觀察，可以理解蔣介石試圖為戰後的中國擘劃一個藍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宣示：「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等於提前2年引發國共政權的爭奪戰。

總之，1943年是中國抗日戰爭極具關鍵的一年；蔣介石選擇在此時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並非意氣之爭，而是要宣揚其重要的政治理念。換言之，蔣介石在領導中國堅忍抗戰5、6年之後，終於在此中國國際地位與個人聲望達到最頂峰之際，藉《中國之命運》一書來建構現代中國。

關鍵字：抗日戰爭、蔣介石、《中國之命運》

#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a: Chiang Kai-shek and His *China's Destiny*

Chin-ching Chen\*

## Abstract

On May 10th, 1943, Chiang Kai-shek published his *China's Destiny*, which was a book onc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Four months later, Mao Zedong himself initiated a campaign of criticism against this book and its author by asserting that *China's Destiny* was “the propaganda book of the third wave against the communism” and that Chiang Kai-shek was “the fascist of China.” In reality, the CCP’s criticism of Chiang Kai-shek and his *China's Destiny* could be more properly considered as a political discourse rather than an historical fact. By examining *China's Destiny*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ang Kai-shek’s endeavors to build a modern China,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the book as the blueprint that Chiang Kai-shek drew for the postwar China.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idea of “one party, one doctrine, and one leader” claimed in *China's Destiny* actually brought forward the CCP-KMT conflict over political power by two years.

In 1943, the very crucial year for the War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hiang Kai-shek should have so chosen to publish *China's Destiny* could not just be interpreted as being out of his personal feelings but apparently having everything to do with the serious intention to propagate his political ide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other words, after the five to six years of leading the war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hiang Kai-shek had chosen to describe his dream for China in *China's Destiny* when the Republic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his personal reputation reached the peak.

**Keywords:** War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hiang Kai-shek, *China's Destiny*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 現代中國的建構： 蔣介石及其《中國之命運》\*

陳進金\*\*

## 壹、前言

1943年3月10日，蔣介石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全書除結論、附錄外共分8章，該書的出版曾在國內外造成極大的影響。<sup>1</sup> 1943年7月，中共針對蔣介石《中國之命運》展開強烈的攻擊，毛澤東親自發起一場批判運動。8月25日，《解放日報》還發表題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社論，用以反駁《中國之命運》的「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的論調。<sup>2</sup> 受到毛澤東批判運動的影響，長久以來的中國大陸史學界，對於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的評價有如下

---

\* 本文曾於2013年11月29-30日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主辦「跨越想像的邊界：族群、禮法、社會——中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初稿，承蒙評論人劉維開教授提供寶貴建議，又承蒙三位匿名審查人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特此感謝。本文為執行國科會計畫部分成果，計畫編號：NSC100-2410-H-259-034。

收稿日期：2013年12月5日；通過刊登日期：2014年4月21日。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sup>1</sup> 張憲文、方慶秋主編，《蔣介石評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532；張瑞德，〈侍從室與戰時國民政府的宣傳工作（1937-1945）〉，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第2冊：變局與肆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頁209-210。

<sup>2</sup>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解放日報》，延安，1943年8月25日，版1。此處徵引自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559-565。

定論：蔣介石推出這部書的動機，是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準備和輿論動員，目的是想挑起新內戰。<sup>3</sup> 或是說：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的目的，就是要壓制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進步的力量，把中國完全置於他和國民黨的極權統治之下。<sup>4</sup> 這樣的論調是「政治多於歷史」，有關蔣介石及其《中國之命運》的議題，應該拋開政治，回歸歷史來探討。

近年來，學者對於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研究已經有不少的成果，或討論《中國之命運》一書所宣示的民族觀或國族同源論，或檢討陶希聖代筆說，或從中共反中國法西斯切入討論，或論述蔣介石的命題與國共兩個口號，或分析國共兩黨爭論中國之命運的背後意涵，或說明蔣氏及其幕僚日記中所提及的《中國之命運》等。<sup>5</sup> 在這些論著中，仍然以探討國共爭議者為多，但已經不再遵毛（澤東）調為定論，而開始有較為深入的分析，例如李楊〈蔣介石與《中國之命運》〉、鄧野〈蔣介石關於《中國之命運》的命題與國共的兩個口號〉等文，都試圖回到歷史的現實面，做出較客觀的分析。

李、鄧等文試圖較為平實地探討1943年《中國之命運》，仍無法避免陷入國共爭議的窠臼，鄧野〈蔣介石關於《中國之命運》的命題與國共的兩個口號〉一文曾云：「蔣著如果沒有設置一個或幾個政治對立面，那麼，《中國之命運》的

<sup>3</sup> 李楊，〈蔣介石與《中國之命運》〉，《開放時代》，2008年第6期，頁39。

<sup>4</sup> 嚴如平、鄭則民於2012出版的《蔣介石傳》一書，對蔣介石於抗日戰爭之評價，與以往中國出版之相關著作已有顯著不同，強調「正面戰場的艱難撐持」；不過，該書有關國共關係相關議題，以及蔣介石之《中國之命運》的評論，仍舊堅持以往中共傳統的解釋。參閱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459-462、466-468。

<sup>5</sup> 較為重要著作有：劉會軍，〈《中國之命運》論析〉，《史學集刊》，1994年第3期，頁36-40；潘光哲，〈郭沫若與〈甲申三百年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12月），頁297-302；李楊，〈陶希聖與《中國之命運》新解〉，《中國社會導刊》，2008年第13期，頁44-46；張瑞德，〈侍從室與戰時國民政府的宣傳工作（1937-1945）〉，頁201-229；婁貴品，〈陶希聖與《中國之命運》中的「中華民族」論述〉，《二十一世紀》，總131期（2012年6月），頁65-72；鄧野，〈蔣介石關於《中國之命運》的命題與國共的兩個口號〉，《歷史研究》，2008年第4期，頁84-98；李楊，〈蔣介石與《中國之命運》〉，《開放時代》，2008年第6期，頁39-51；李楊，〈陶希聖與《中國之命運》的歷史與解讀〉，收入湯應武主編，《黃埔軍校研究》，第4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王震邦，〈蔣及幕僚日記中的《中國之命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國際學術討論會」，2013年11月1-3日。

提出就是多餘的。因此，蔣著必然是一部批判性質的論著，通過一連串聯繫、比較、批判與揚棄，由此而論證其所提的問題。」<sup>6</sup> 鄧文似乎認為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自始即充滿著政治算計。事實上，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時引發國內各界及盟邦的議論，但蔣氏仍然決定於翌年（1944）1月1日再出版《中國之命運》增訂版；如果這是一種政治算計的話，蔣介石似乎是在從事一門蝕本的生意。到底蔣介石執意撰述本書的背景與目的為何？該書所引發的爭論情形與背後意涵為何？這些問題都是本文所欲討論的重點。

此外，本文想要提出一個命題，即1928年成為中國實際領導者的蔣介石，他是否曾經試圖建立一個統一的、現代性的中國呢？以往有關抗戰前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大都會強調其為「新軍閥」或「法西斯」，認為蔣氏討伐地方軍人是一種「削藩」，較少從現代中國建構的角度分析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如果上述命題成立的話，那麼在1928年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後，身為中央領袖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其在建立政權的過程中，努力整合地方勢力，建立一個訓政體制的國家，就是建構現代中國的第一步。<sup>7</sup> 延續同樣的命題，1943年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是否也可以放在蔣氏建構現代中國的脈絡中觀察？這也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 貳、《中國之命運》的出版

1942年10月10日，蔣介石開始構思欲撰寫《中國之命運》（原書名為《國民革命風》），1943年3月10日《中國之命運》正式出版，以往部分中共學者認為：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是為了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準備與輿論動員。回到歷史現場，從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3月間，國共之間沒有發生齟齬，更無劍拔弩張的情形；相反地，此時期正是自新四軍事件以來國共最為和諧的時刻，也是國共頻頻往來和談的時期。

---

<sup>6</sup> 鄧野，〈蔣介石關於《中國之命運》的命題與國共的兩個口號〉，頁90。

<sup>7</sup> 陳進金，〈蔣介石的國家觀與實踐（1928-1937）〉，《民國研究》，總17輯（2010年5月），頁29-49。

1942年7月5日，中共駐重慶代表董必武約見國民黨代表王世杰時即表示：希望政治解決國共糾紛問題。<sup>8</sup> 7月7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為紀念抗戰五週年宣言〉聲明：「一致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中國共產黨承認，蔣委員長不僅是抗戰的領導者，而且是戰後新中國建設的領導者。」中共「願盡自己的能力來與國民黨當局商討解決過去國共兩黨間的爭論問題，來與國民黨及各抗日黨派商討爭取抗戰最後勝利及建設戰後新中國的一切有關問題。」<sup>9</sup> 大約同一時期，毛澤東電令中共各地領導人，避免與國民黨發生衝突。<sup>10</sup> 8月中旬，蔣介石約見周恩來表示願意親自接見毛澤東商談國共關係問題，毛澤東甚至已經準備親自見蔣，以求將國共根本關係加以改善。<sup>11</sup> 後來，毛澤東以罹患感冒為由，改派林彪赴西安晉謁蔣介石。<sup>12</sup> 11月27日，中國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通過〈今後對共產黨政策之研究結果案〉表示：對共產黨仍本寬大政策，只要服從政府命令，忠實地實現三民主義，自可與全國軍民一視同仁。<sup>13</sup>

國民黨的「十中宣言」被中共視為其對「七七宣言」的善意回應，引起中共黨人的重視；11月29日，中共中央的指示曾提到：

十中全會的這一決議，對於從一九三九年到現在四個年頭的國共不良關

---

<sup>8</sup>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頁442。

<sup>9</sup>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紀念抗戰五週年宣言〉，《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7月7日，版1。

<sup>10</sup> 「熊式輝電蔣中正最近周恩來在重慶與美方談話中央召其會商表力避與共軍衝突擔保胡宗南軍決不進攻共軍等兩點要點」（1942年7月26日），〈國共協商（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4-00010-001；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430。

<sup>11</sup> 〈周恩來關於蔣欲約見毛在陝晤談事致毛澤東電〉（1942年8月14日）、〈毛澤東關於見蔣事致周恩來電〉（1942年8月19日、1942年9月3日），轉引自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頁430。

<sup>12</sup> 「周恩來電蔣中正毛澤東因感冒不克應召擬派林彪赴西安晉謁」（1942年8月18日），〈中共詭謀與異動（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50-045。

<sup>13</sup> 〈今後對共產黨政策之研究結果案〉，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80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二）》（臺北：編者，1979年），頁290。

係，作了個總結，是對於我們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開闢了今後兩黨繼續合作及具體談判與解決過去存在著的兩黨爭論問題的途徑。<sup>14</sup>

該指示中提醒中共黨員：「對於國民黨人員，應繼續採取誠懇協商，實事求是，有理有節的態度，力戒驕傲誇大、有害無益的態度，借以爭取更進的好轉。」<sup>15</sup> 中共中央也正式公開回應國民黨十中全會，表示：「共產黨人的立場，一切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基礎」，「深望中國國民黨人士諒解吾人此種為國為民之誠意，達到進一步之合作。」<sup>16</sup> 12月1日，毛澤東就示範如何爭取更進一步的好轉，毛氏親自致函蔣介石表示：「前承寵召，適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晉謁，嗣後如有垂詢，敬乞隨時示知，自當趨轅聆教。」<sup>17</sup> 12月24日，依據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周恩來、林彪向國民黨代表張治中提出4項條件，包括黨的問題、軍隊問題、陝北邊區和作戰區域等，以作為國共雙方談判的基礎。<sup>18</sup> 由上述可知，此時期的國共關係趨於和解，若說蔣介石選擇在此時醞釀書寫一本「掀起反共高潮」的宣傳書，似乎不合情理。

《中國之命運》如果不是一本反共宣傳書，則蔣介石撰寫此書的目的為何？1942年10月10日下午，蔣介石在重慶的一場檢閱青年團團員的訓詞中宣布：美、英兩國已經通知中國放棄一切在華特權，且將商訂平等新約的日子。蔣氏表示：「我國近百年來所受各國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至此已可根本解除，總理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遺囑亦可云完全實現。」<sup>19</sup> 就在這一天（10月10日），蔣介石決定撰寫《中國之命運》一書，故可以判斷蔣氏撰寫該書的動機與此有關。其次，檢驗《中國之命運》全書內容，全書8章中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相關者中即占3章，若以頁

<sup>14</sup> 〈中央關於國民黨十全會問題的指示〉（1942年11月29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460。

<sup>15</sup> 〈中央關於國民黨十全會問題的指示〉，頁460-461。

<sup>16</sup> 〈中共中央評國民黨十全會〉（1942年11月29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頁463-464。

<sup>17</sup>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319。

<sup>18</sup>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2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頁141-142。

<sup>19</sup>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1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頁387-388。

數統計則全書223頁中有112頁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直接相關，超過全書之半。<sup>20</sup> 再者，陶希聖也提到蔣介石撰寫《中國之命運》的宗旨，除了1942年10月10日的訓詞外，還與1943年1月13日簽訂中美、中英平等新約時所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有關。<sup>21</sup> 蔣氏撰寫此書期間，曾多次約陳布雷、陶希聖商談書稿內容中有關「七七事變以前，與今日我國對倭政略之成就，使美、英、俄各國知我國抗戰對世界貢獻之大。」<sup>22</sup> 是以，美國學者費正清也認為：該書是為慶祝1943年英、美廢除不平等條約而出版，出版此書的目的是藉以重振道德來激勵民族復興。<sup>23</sup> 10月27日，蔣介石提到：

際茲不平等條約取消，外交勝利之時，應不失機宜，推行戰時生活，改造民眾心理，轉移社會風氣，革除政治習性……。使人民能為國家服務，不失為現代國民，而得能與聯合國各國之國並肩作戰，對世界戰事能有所貢獻，如此方不愧為獨立自由國家之國民也。<sup>24</sup>

足見蔣氏撰寫此書的動機，是想藉著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新時刻到來之際，來推行戰時生活，以改造民眾心理，轉移社會風氣，革除政治習性，以使人民成為現代國民，俾以建構一個具有現代性的中國。

有關《中國之命運》一書的撰述經過如下：1942年10月26、27日，蔣介石親自主擬訂《國民革命風》之要旨大綱，邀陳布雷、陶希聖商議，決定由陶希聖負責撰稿。<sup>25</sup> 11月7日，蔣介石4度修正書稿內容，並決定將《國民革命風》正式改名為《中國之命運》。<sup>26</sup> 蔣氏對於陶希聖所撰寫的初稿並不滿意，從1942年12月22日

---

<sup>20</sup> 《中國之命運》一書之第二章「國恥的由來與革命的起源」、第三章「不平等條約影響之深刻化」、第四章「平等新約的內容與今後建國工作之重心」，參閱蔣介石，《中國之命運》（臺北：正中書局，1952年），頁13-82、123-164。

<sup>21</sup> 陶希聖，〈關於《中國之命運》〉，收入氏著，《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4年），頁203。

<sup>22</sup>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1冊，頁610。

<sup>23</sup> 費正清著，張理京譯，《美國與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頁183。

<sup>24</sup>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1冊，頁437-438。

<sup>25</sup>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1冊，頁482、484；王泰棟，《陳布雷日記解讀：找尋真實的陳布雷》（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頁220。

<sup>26</sup>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學記》（臺北：國史館，2011年），頁269。



起至該年年底，蔣介石幾乎天天在修改《中國之命運》書稿。<sup>27</sup> 關於蔣介石屢屢改稿一事，陶希聖曾云：

自三十一年十月十日起，蔣委員長即著手撰述一本書。至十一月至十二月之間，在黃山官邸，以四十多天的功夫，再三、再四改稿，每一章每一節的命意與行文，經過七、八次，乃至十餘次的修訂與增刪，方纔定稿。十二月下旬，全書的稿子已定，交南岸海棠溪附近之南方印書館印刷樣本二百冊。<sup>28</sup>

事實上，陶希聖上段記述並不精確，因為蔣介石於1943年1月後仍繼續修改《中國之命運》書稿，經過5次修改補正後，直至1月30日完成付梓。而且，即使書稿已經送印出版中，蔣氏仍繼續修改書稿內容，直到2月10日才正式定稿。<sup>29</sup> 2月13日，蔣介石自記曰：「自去年11月杪，撰著《中國之命運》一書，兩月以來，不能照常閱讀學案，今始恢復常課。」<sup>30</sup> 長久以來，學界幾乎一致認為陶希聖是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的代筆者，但是觀察上述蔣介石修訂該書之經緯，陶希聖雖為代筆者，但從著書的立意或觀點，蔣介石都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sup>31</sup> 陶希聖的外孫沈寧也曾經提過：「外祖父後來幾次說，他自己用黑墨書寫，蔣介石以紅

<sup>27</sup> 蔣介石於12月22日修改第一章、第二章，23日上午修改第三章、第四章，晚上修改第五章。24日，記述曰：「昨夜修改《中國之命運》，今晨二時醒覺，思五項建設之內容不必列舉，只擇其最要者提示之，使青年易於了解而樂從為宜。」25日蔣又修改《中國之命運》。26日，蔣氏記下：「《中國之命運》內國民黨之特點一段，手擬畢，交陶希聖注意補入之。」同時提到：「《中國之命運》一書必須完全自著，布雷體弱多病，不能隨時協商，是近日最大之缺憾也。」27日，蔣氏又云：「陶希聖之文筆與思想皆不合余意，關於經濟民生為本文重點與國民黨之特點二篇仍須完全由余親擬。」31日，蔣氏則提到：「本月以所擬《中國之命運》原稿膚淺不能用，皆須重加手著。」參閱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學記》，頁272-274。

<sup>28</sup> 陶希聖，〈關於《中國之命運》〉，收入氏著，《潮流與點滴》，頁204。

<sup>29</sup>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學記》，頁275-279。

<sup>30</sup>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學記》，頁275-279；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2冊，頁488。

<sup>31</sup> 以往學界幾乎一致認為陶希聖是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的代筆者，近年來有學者持不同看法，認為：「陶希聖代書《中國之命運》的觀點至少是簡單化，甚至是不準確的。」參閱李楊，〈陶希聖與《中國之命運》新解〉，《中國社會導刊》，2008年第13期，頁46。不過，也有學者強調《中國之命運》初版中關於中華民族的論述，確實與陶希聖有關。參閱婁貴品，〈陶希聖與《中國之命運》中的「中華民族」論述〉，頁65-67。

墨修改，文稿修改到最後，已經見不到一個黑字，全篇紅墨。」<sup>32</sup>「已經見不到一個黑字，全篇紅墨」，足以說明《中國之命運》一書是蔣介石理念的呈現。

1943年1月底，《中國之命運》付印200冊樣書，分送黨內及政府負責人士讀閱，並請其簽註意見。根據陶希聖的回憶，共計回收百餘份意見書予以集中整理，修改建議大都被採納，全稿重加通盤修訂後，才交由正中書局印刷普及本。<sup>33</sup>陶希聖負責《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文文稿的整理、校訂，以及排印、校對工作，於1943年3月10日正式出版。<sup>34</sup>至於該書英文譯稿的指導和校訂工作，則交由王寵惠負責。<sup>35</sup>《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3日（10-12日），僅重慶一地，零售就已在5萬冊以上。<sup>36</sup>蔣介石為了廣為推銷該書理念，3月24日致電國防最高委員會祕書長王寵惠，令各級機關學校、官兵等研討《中國之命運》並表達意見。<sup>37</sup>26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即函各級政府機關呈報研討《中國之命運》一書讀後感，並要求選擇相關內容研擬具體實施辦法。<sup>38</sup>4月5日，蔣氏又致電王寵惠令各高級官長研讀《中國之命運》一書並加以評論。<sup>39</sup>因為蔣介石大力推銷《中國之命運》一書，自3月出版至5月，正中書局即印了130版，共銷售130萬冊以上。<sup>40</sup>抗日戰爭末期的中國，宣揚蔣介石理念的《中國之命運》成為當時最暢銷的一本書，其結果卻反

---

<sup>32</sup> 沈寧，〈我的外祖父為蔣介石執筆《中國之命運》〉，《文史博覽》，2009年第9期，頁14。

<sup>33</sup> 陶希聖，〈關於《中國之命運》〉，《潮流與點滴》，頁204。

<sup>34</sup>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2冊，頁693。

<sup>35</sup> 「蔣中正電陳布雷請王寵惠在譯中國之命運者中擇人兼譯中國經濟學說」（1943年3月19日），〈抗戰時期（五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300-00051-013；陶希聖，〈關於《中國之命運》〉，《潮流與點滴》，頁204。

<sup>36</sup>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學記》，頁284。

<sup>37</sup> 「蔣中正電王寵惠令各級機關學校官兵等研討《中國之命運》並呈意見」（1943年3月24日），〈交擬稿件—民國三十二年一月至民國三十二年三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70200-00017-070。

<sup>38</sup> 「國防最高委員會函各級政府機關呈報研討批評中國之命運一書讀後感並擇相關內容研擬具體實施辦法」（1943年3月26日），〈「中國之命運」之研討〉，《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90084-0004。

<sup>39</sup> 「蔣中正電王寵惠令各高級官長研讀『中國之命運』一書並作評論」（1943年4月5日），〈交擬稿件—民國三十二年四月至民國三十二年七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70200-00018-003。

<sup>40</sup> 陶希聖，〈關於《中國之命運》〉，《潮流與點滴》，頁210。

而引爆一場來自黨內外的風暴。

### 叁、《中國之命運》的爭論

1943年3月10日，《中國之命運》一書正式出版，中共直到7月才展開批判行動，但在中共之前已有來自國民黨內的不同意見。3月24日，四川省主席張群與參政會祕書長王世杰電話聯繫時，對於《中國之命運》指責英、美、俄過去對華政策部分，深以其將傷及友邦感情為慮。<sup>41</sup> 3月30日，蔣介石詢問王世杰將《中國之命運》譯成英文向國外發行時，王氏認為此書將對友邦人士造成刺激，建議英譯本應摘由意譯，刪略一切刺激外人的言語。<sup>42</sup> 4月9日，為了該書英譯一事，王世杰、王寵惠、吳鐵城、何應欽和朱家驊等人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商議，與會諸人都擔心書中內容將可能損及友邦情誼，連平常較為寡言的王寵惠也語多憂慮。<sup>43</sup> 同一時間（4月8-9日），由參謀總長何應欽召集軍事委員會辦公廳各部次長以上人員，也正在共同研討《中國之命運》一書，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記錄當時的情形如下：

午前九時赴會，繼續研討《中國之命運》一書，秦副監（按：秦德純）因事未參加。昨、今兩次研討，均由何總長（按：何應欽）主席，命祕書一人持原書朗讀，每讀畢一段，即詢問在座諸人有無意見，有者可盡量陳述，以備採擇，作出第二版時修正之資料。此書撰擬於忙迫之際，自不無絲毫偏差，但其大體則實極善極美，結果發表意見者頗多，大半以此書為我國最高領袖所撰述，對外關係不能不審慎顧慮，免外人有所批評，喪失尊嚴。至十二時半未畢，主席宣布終止研討，各就其意見所及，逐條筆記，限十一日以前送交辦公廳商主任（按：商震）彙齊，由梁副部長寒操、李副主任中襄加以有系統之整理，再繕呈最高領袖之案

<sup>41</sup>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頁496。

<sup>42</sup>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頁497-498。

<sup>43</sup>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頁499。

旁，隨時用作參考。<sup>44</sup>

有學者根據國防最高委員會發出的代電（1943年4月18日），表示蔣介石無意修訂該書，認為：蔣氏要求官員提交讀書報告，其實質就是要求人人表態。<sup>45</sup>實際上，何成濬這段《日記》正說明當時黨政高層研讀《中國之命運》非常熱烈，歷經3個半小時仍無法討論完畢，而且會後還將意見彙整，俾以提供蔣介石修訂二版時參考。不過，陳克文對於行政院祕書長張厲生於討論會上的態度虛偽，則感到不以為然。<sup>46</sup>

實際上，4月18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雖然發出代電，要求全國各級政府機關、各級黨部、各大中學、各戰區、各級政治部，以及全體官兵等均應切實研讀《中國之命運》，同時也要求將研讀結果與批評意見呈報，即使是經濟部的事業單位，如湖南電氣特種股份有限公司、鑛業管理處贛南分處都被要求呈復研讀心得與意見。<sup>47</sup>根據陳克文的觀察，許多部會次長研讀《中國之命運》的心得報告，十之八、九係敷衍了事的文章。<sup>48</sup>不過，蔣介石確實參考了各方的意見（心得），從6月16日開始校正修訂《中國之命運》二版。<sup>49</sup>因此，蔣氏要求各界撰寫心得與提出意見之舉，絕不能逕以「要求人人表態」來論斷。

4月9日，曾經參與軍事委員會共同閱讀《中國之命運》一書的軍令部長徐永昌，也在他的《日記》上留下這次研討的情形，徐永昌說：「除為章（按：劉斐）外，咸謂第三章（不平等條約影響之深刻化一章）不惟過於刺激其他各友

---

<sup>44</sup> 何成濬，《何成濬將軍戰時日記》，上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頁244-245。

<sup>45</sup> 鄧野，〈蔣介石關於《中國之命運》的命題與國共的兩個口號〉，頁93。

<sup>46</sup> 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頁738。

<sup>47</sup> 〈中國之命運讀後心得及研討報告〉，《資源委員會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3-010102-1190。

<sup>48</sup> 陳克文在日記中記載公務人員撰寫《中國之命運》閱讀報告時，有前後不一之處，曾說：「許多各部會次長研讀《中國之命運》的心得報告，十之八九係敷衍了事的文章。」又說：「寫《中國之命運》研讀後的報告。這種報告係奉命而作，……想敷衍也不容易。」參閱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頁739、743。

<sup>49</sup>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學記》，頁297。

國，亦極難堪英國，在今日而言此，殊嫌不智。」<sup>50</sup> 由上述可知，無論王寵惠、王世杰、何成濬、徐永昌等黨政高層，均擔憂此書出版將影響戰時中國的對外關係，尤其是英國的反應。而這樣的擔憂是有道理的，因為在前一年（1942年），中、英兩國談判平等新約時，就曾經因為西藏問題有所爭議，蔣介石對於英國為了己身利益，而不擇手段作風的評語是：「可惡」<sup>51</sup> 二字。是以，中英新約雖於1943年1月11日簽訂，但蔣介石認為與英國仍是「鬥爭外交」<sup>52</sup> 的狀態；故蔣氏在簽約之後開始撰寫《中國之命運》一書，將英國與其他列強帝國主義國家同樣看待，蔣氏說：「西藏問題一樣受外來的影響。藏人與川、滇的衝突，亦為英人所利用。而英人之操縱達賴，與俄人之利用班禪，事正相同。」<sup>53</sup> 基於此，英、美各國對於《中國之命運》一書都有所批判，英國政府對於該書內容涉及西藏表示不滿；美國國務院遠東部門也提到：這本書內容反映的是「反動型民族主義」，是「令人不快及不幸的愚蠢和過火行為」，並無益於中國與其他大國間的合作。<sup>54</sup> 因此，費正清（J. K. Fairbank）也提過：蔣氏撰寫《中國之命運》是打算點燃排外主義的怒火，以激起愛國情緒，進以促成其內部的凝聚。<sup>55</sup>

對於英國的反彈，蔣介石的心裡似有所準備，《事略稿本》1943年10月7日記載：「《中國之命運》出版以來，最受反響者，一為英國，二為共匪，此為預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有如此之大也。凡事利害不能完全避免，自信此書對於國家與民族之影響將愈久而愈大。」<sup>56</sup> 除了英國之外，中共對於《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反響更大，毛澤東甚至將此書定位為一本「掀起反共高潮的宣傳書」，乃親自發起一場批判運動；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一文首發其端，范文瀾、呂振

<sup>50</sup>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7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57。

<sup>51</sup>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2冊，頁174。

<sup>52</sup>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5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頁716。

<sup>53</sup> 蔣介石，《中國之命運》，頁50。

<sup>54</sup> Xiaoyuan Liu, *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41-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3, 74, 轉引自張瑞德，〈侍從室與戰時國民政府的宣傳工作（1937-1945）〉，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第2冊：變局與肆應，頁209-210。

<sup>55</sup> 費正清（J. K. Fairbank）著，陸蕙勤等譯，《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年），頁296。

<sup>56</sup>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5冊，頁37。

羽、齊燕銘、艾思奇等人也都撰文，分別從歷史、文化、法律、哲學等進行全面批判。

7月21日，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一文，首先刊登於延安《解放日報》，之後中共中央宣傳部將該文印成一本小冊子廣泛發行，除了黨政軍民幹部每人1本外（陝甘寧邊區印了1萬7千本），並要求南方局、華中局在重慶、桂林、上海等地密發，同時特別強調「注意散發到國民黨軍隊中去」，應趁此機會作一次對黨內、外的廣大宣傳。<sup>57</sup> 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一文開宗明義就說：

《中國之命運》既是以蔣介石先生的名義出版的，就因蔣先生的關係，引起人們的注意。當此抗戰處在重要關頭的時候，大家想蔣先生在這個時候出版這本東西，應該是對於如何準備對敵反攻、配合盟國作戰、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重大問題，有所指陳。因為盡人皆知：今日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是抗戰，而不是其他。但大家讀到《中國之命運》後卻不免大失所望，原因是那書中所提出的問題，和人們所期望的都相反，而且關於抗戰問題，在全書二一三頁當中，只占了十二頁半。全書中心是談內政問題。一言蔽之，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實際上主張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或新專制主義（雖然形式上仍戴著「三民主義」的帽子），因此使人們大失所望。<sup>58</sup>

陳伯達一文是經過毛澤東修訂才發表的，因此可視為是執行毛意志的一篇文章，陳文認為《中國之命運》第七章「中國革命建國的動脈及其命運決定關頭」是全書的核心，其中心思想，在實質上說來，是「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

---

<sup>57</sup> 〈中央宣傳部關於廣泛印發《評〈中國之命運〉》的通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79。

<sup>58</sup> 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原文刊登於延安《解放日報》1943年7月21日第4版，隨後中共中央宣傳部印成一本小冊子廣泛發行；抗戰勝利後（1945年9月），又與范文瀾〈誰革命？革誰的命？〉、艾思奇〈《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和齊燕銘〈駁蔣介石的文化觀〉等文合成一本專書，書名仍為《評《中國之命運》》，本文相關文章主要參閱此書。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收入陳伯達等著，《評《中國之命運》》（張家口：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1945年），頁1-2；另可參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頁504-505。

袖」，即「國民黨即中國，中國即國民黨」。因此，陳文特別鎖定這一章展開激烈批判，稱本書是「一本對中國人民的宣戰書，是為發動內戰的思想準備與輿論準備。」<sup>59</sup> 隨後，范文瀾在〈誰革命？革誰的命？〉一文中，要蔣介石在決定「中國之命運」時，先學習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並強調中國共產黨才是革命建國者，范文瀾忠告蔣介石要放棄「朕即國家」、「實行一個新專制主義」的荒謬思想。<sup>60</sup>

中共對蔣介石及其《中國之命運》的批判，一波接著一波，除了動員學者從學理方面的批判外，中共中央也開始進行反擊。為了強化對蔣氏《中國之命運》一書的攻擊，除了由專人教導發言技術之外，還由中華全國文藝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理事模擬蔣介石的角色，連續於1943年8月12、13日舉行模擬辯論會。<sup>61</sup> 足見中共中央對批評《中國之命運》一書的重視。8月13日，毛澤東也致電中央局指示：「盡一切方法避免和國民黨破裂，避免大內戰，同時揭露國民黨抗戰不力與反共陰謀，對抗國民黨的反共言論，並準備自衛實力。」<sup>62</sup> 8月23日，中共又發表〈國共兩黨抗戰成績的比較〉、〈中國共產黨抗擊的全部偽軍概況〉二文，說明蔣介石所謂「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是沒有根據的，且中華民族的興亡繫於中國共產黨。<sup>63</sup> 8月25日，《解放日報》的社論則刊登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提出了3個事實證明：一、「不是共產黨的軍隊『游而不擊』，而是國民黨反動派不游不擊。」二、「不是共產黨是『新式封建』和『變相軍閥』，而是國民黨反動派是老式封建焊道地軍閥。」三、「中國共產黨是萬萬取消不得，證明了：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sup>64</sup> 此篇社論，正是中共攻擊蔣介石及其

---

<sup>59</sup> 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收入陳伯達等著，《評《中國之命運》》，頁40-41、45。另可參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頁530-531、534。

<sup>60</sup> 范文瀾，〈誰革命？革誰的命？〉，收入陳伯達等著，《評《中國之命運》》，頁53、60-63。

<sup>61</sup> 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下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03。

<sup>62</sup> 〈對擊退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後形勢的分析和關於黨的政策〉，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頁87-88。

<sup>63</sup> 〈國共兩黨抗戰成績的比較〉、〈中國共產黨抗擊的全部偽軍概況〉，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頁547-558。

<sup>64</sup>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頁559-565。

《中國之命運》最高峰的作品。

觀察此時期中共對蔣介石及其《中國之命運》的批判，主要的攻擊策略是：擬定以「反中國的法西斯」為批判架構的鬥爭觀點，陸續推出相關的反擊宣傳。換言之，中共當局希望透過「反中國的法西斯」的觀點和言論，讓黨內成員及治下群眾對國民黨、蔣介石有一致的認識。<sup>65</sup> 事實上，中共對《中國之命運》的攻擊並不完全合理，以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一文為例，該文認為《中國之命運》一書不談抗戰，抗戰內容僅占12頁半，又說第七章「中國革命建國的動脈及其命運決定關頭」是全書的核心；其實，若根據陳氏論點，以篇幅計算《中國之命運》中的第七章也僅占15頁半，全書的內容主要環繞著廢除不平等條約，共計3章112頁。<sup>66</sup> 另外，中共稱《中國之命運》是掀起第三波反共高潮的宣傳書，事實上連中共學者楊天石都認為：第三波反共稱不上「潮」，更從沒有「高」過。<sup>67</sup> 因此，所謂「第三波反共高潮」，只是當年毛澤東批判行動的政治話語，蔣介石雖然於《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批判中共是新軍閥，但是強說此書「掀起第三波反共高潮」，不僅稍嫌誇大，也高估了當時中共的影響力與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於1943年3月，中共的攻擊行動則遲至7月下旬才展開，觀察這4個多月國內外情勢演變，就可以瞭解中共發動攻擊《中國之命運》的原委。

1942年2月，毛澤東在延安展開整風運動，即「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整頓三風運動。<sup>68</sup> 1943年3月，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重申黨一元化領導的重要性，再次確定政治局勢中共最高領導機構，決定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等重要問題，由毛

<sup>65</sup> 潘光哲，〈郭沫若與〈甲申三百年祭〉〉，頁297-301。

<sup>66</sup> 本文有關《中國之命運》之相關內容主要是根據1952年臺4版，第七章的頁次為197-212，與不平等條約相關者有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參閱蔣中正，《中國之命運》（臺北：正中書局，1952年），頁13-48、49-82、123-164、197-212。

<sup>67</sup> 楊天石，〈第三國際的解散與蔣介石「閃擊」延安計畫的撤銷——論「第三次反共高潮」並未成「潮」〉，收入氏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下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45、407-423。另可參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頁530-531、534。

<sup>68</sup>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頁370-376。



澤東擔任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4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繼續開展整風運動，認為黨內的內奸人數驚人，要求澈底肅清。<sup>69</sup> 其實，共產黨內並無嚴重內奸問題，只是為了累積更多的人事資料，以便審查幹部，推動整風學習，而其終極目的是將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由毛一人擁有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等重大事務的最後決定權。<sup>70</sup> 7月，毛澤東開始向蔣介石及其《中國之命運》展開批判，正是呼應其延安的整風運動，使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更為強化。

1943年5月22日，共產國際宣告解散，對於蔣介石而言，這是「劃時代之歷史」，<sup>71</sup> 蔣氏認為：第三國際宣布解散，是「二十世紀上半期之唯一大事」，「不僅為此次世界戰爭中最有價值之史實，且為我國民革命三民主義最大之勝利。」<sup>72</sup> 因此，蔣介石乃加強對中共的軍事攻勢與政治攻勢；6月17日，蔣介石還致電胡宗南詢問邊區準備至何種程度。<sup>73</sup> 熊斌、劉學海也曾經致電蔣介石稱：查奸黨自共產國際解散後，各派鬥爭益烈，內部日形分化，幹部動搖，趁此時期解決實為最適當良機。<sup>74</sup>

對於中共而言，共產國際突告解散，確實讓其充滿不確定的危機感；5月26日，中共中央針對共產國際解散做出了回應，表示：完全同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更進一步說明共產國際的解散，將使中國共產黨人的自信心與創造性更為加強。<sup>75</sup> 5月3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立即指示：「抗戰六週年之宣傳，應該集中我軍在敵後堅持抗戰之英勇壯烈，並說明我們之所以能

<sup>69</sup> 〈中共中央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頁28-33。

<sup>70</sup>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頁384-385。

<sup>71</sup>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3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頁498。

<sup>72</sup>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3冊，頁531。

<sup>73</sup> 「蔣中正電詢胡宗南邊區準備至何程度」（1943年6月17日），〈抗戰時期（五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300-00051-050。

<sup>74</sup> 「劉學海電蔣中正查奸黨自共產國際解散後各派鬥爭益烈內部日形分化幹部動搖乘此時期解決實為最適當良機等」（1943年7月12日），〈共匪禍國增編（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300-00223-095。

<sup>75</sup>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頁38-41。

夠堅持的原因，藉以擊破游而不擊、封建割據及交出軍隊、政權之類的反動宣傳。」<sup>76</sup> 6月1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指出：「國民黨對我疑忌甚大，不願解決問題，天天宣傳我罪狀，打擊我黨威信，勵行特務政治，圖從內部破壞我黨。」毛進一步提到其黨內政策為：「一是整頓三風（應堅持一年計畫），二是審查幹部（清查內奸包括在內），三是保存幹部（送大批幹部來後方學習）。如能實施上述各項，不犯大錯，我黨即可立於不敗之地。」<sup>77</sup> 7月4日，中共中央也獲得了胡宗南進攻計畫方案。<sup>78</sup> 在在顯示，中共在共產國際解散和國共和談擱置後的不安全感，乃於此時發動對《中國之命運》的攻擊行動。

此外，1943年前後的中蘇關係趨於冷淡，莫斯科方面從1943年7月起開始批評在重慶的國府，將中國抗戰的光榮全部加諸在中共身上，對國民政府不讚一詞。同時，指稱國民政府裡面有「綏靖主義者，失敗主義者及投降派所進行的陰謀活動。」<sup>79</sup> 中共配合蘇聯對華態度的改變，展開一系列攻擊《中國之命運》的言論，正是其為爭奪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政權作準備。<sup>80</sup>

綜合上述，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後，即遭國民黨的黨政軍高層的質疑，幾乎一致認為該書對於不平等條約的描述，恐損及友邦情誼，將影響戰時中國的外交關係。不過，對於《中國之命運》一書最大的攻擊來自中共，自1943年7月下旬起，毛澤東即親自組織一場「反中國法西斯」的鬥爭行動，試圖讓黨員、群眾對國民黨和蔣介石有一致的認識，最終目的則是強化毛澤東思想與領導一尊的地位，便於戰後與蔣介石進行政權的爭奪。

蔣介石對於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後，引發黨內外的爭議了然於胸，也瞭解抗戰關鍵時刻友邦情誼的重要性。<sup>81</sup> 但是，蔣介石仍然決定於1944年元旦再

---

<sup>76</sup> 〈中央書記處關於紀念抗戰六週年宣傳工作的指示〉，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頁43。

<sup>77</sup> 〈對國民黨現狀的分析和關於我黨今後的工作方針的指示〉，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頁44-45。

<sup>78</sup> 〈軍委關於蔣介石進攻邊區的軍事部署的情況通報〉，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頁62-66。

<sup>79</sup> 陶希聖，〈關於《中國之命運》〉，《潮流與點滴》，頁210-211。

<sup>80</sup> 李楊，〈蔣介石與《中國之命運》〉，《開放時代》，2008年第6期，頁47-48。

<sup>81</sup>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學記》，頁308。

出版增訂版，這絕不是蔣介石的意氣之爭，而是蔣氏在領導中國堅忍抗戰5、6年之後，見到抗日戰爭勝利已露出曙光，欲藉《中國之命運》一書來規劃未來的現代中國。

## 肆、現代中國的想像與建構

《中國之命運》初版印行後，王寵惠、王世杰曾經當著蔣介石的面，批評陶希聖不應撰寫批評不平等條約之內容。<sup>82</sup> 事實上，《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前，陶希聖也曾經建議刪除相關內容，陶氏曾提到《中國之命運》初版付梓時，他有4項建議並沒有被蔣介石所採納，包括：一、本書不必追述過去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的弊害與國家危困，因為追述過去，勢必涉及當時的友邦，並且不平等條約業已取消，又何必重提舊事。二、本書預期抗戰勝利不出兩年之外的文句，應予以刪除。三、《中國之命運》的書名宜加修改為《中國之前途》。四、蔣委員長為國家領袖，不必自居於一黨的領袖，所以第七章「關於中國國民黨及三民主義青年團」應該刪除。<sup>83</sup>

針對上述4點意見，蔣介石的回應是：一、中國百年來國家積弱之勢與國民從自大轉為自卑的心理，都是導源於列強的侵略與不平等條約的壓迫。現在不平等條約由於革命抗戰之堅貞奮鬥而得以解除，一般國民如何改變其民族自卑感而培養其民族自尊心，國家如何與世界各國立於平等地位，而分擔世界和平的責任，這就是中國今後的根本課題。因此，倘如刪去這些章節，那全書將失其意義。二、中國抗戰將與世界大戰一同結束，現在義大利已經投降，德、日兩國的敗形已見，世界大戰勝利結束不出兩年之外。因此，中國政府與國民要在這兩年中盡更大的努力，爭取勝利，並對戰後建設事業預為準備。三、書名《中國之命運》是根據國父所說：「國家之命運在於國民之自決」，這句話是全書的宗旨之所在。四、中國國民黨乃是革命建國的黨，沒有國民黨就沒有國民革命，沒有國民革命就沒有當前抗戰與戰

<sup>82</sup> 陶希聖口述，陳存恭、蘇啟明、劉妮玲訪問，陳存恭、尹文泉總整理，《陶希聖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頁164。

<sup>83</sup> 陶希聖，〈關於《中國之命運》〉，《潮流與點滴》，頁204-205。

後的建國事業。<sup>84</sup> 綜合上述，蔣介石不僅透過《中國之命運》一書來從事心理建設，<sup>85</sup> 更重要的是欲透過該書來試圖建構現代中國，其重要內容如下：

## 一、民族同源

蔣介石在闡釋「現代國民」之前，先對中華民族的形成有所說明，且是《中國之命運》一書的重點之一；該書初版時提到：「就民族成長的歷史來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合而成的。融合於中華民族的宗族，歷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動力是文化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又說：「四海之內，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於一個始祖，即是相結以累世的婚姻。《詩經》上說：『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就是說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詩經》上又說：『豈伊異人，昆弟甥舅』，就是說各宗族之間，血統相維之外，還有婚姻的繫屬。」<sup>86</sup> 1942年8月27日，蔣介石在青海西寧對漢、滿、蒙、回、藏各族仕紳的講演中已經提過同樣的觀點。<sup>87</sup> 這是一直流行於中國的民族「融合論」與「同源論」，與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國民族戰史》兩書的論點相近，故《中國之命運》初版所提到中華民族的形成應與陶希聖有關。<sup>88</sup> 不過，根據陳布雷對於《中國之命運》增訂版的說明，與初版不同之處，其中一項為：「第一章對於中華民族成長之歷史說明有所增益。」<sup>89</sup> 在增訂版中，有關中華民族形成，已經刪除「融合於中華民族的宗族，歷代都有增加」一語，而強調：「這多數的

<sup>84</sup> 陶希聖，〈關於《中國之命運》〉，《潮流與點滴》，頁205。

<sup>85</sup>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5冊，頁720。

<sup>86</sup> 本文所參閱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為1944年的增訂版，有關1943年初版之內容係轉引自婁貴品論文，參閱婁貴品，〈陶希聖與《中國之命運》中的「中華民族」論述〉，頁67-69。

<sup>87</sup>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1冊，頁111-112。

<sup>88</sup> 婁貴品，〈陶希聖與《中國之命運》中的「中華民族」論述〉，頁65-67。

<sup>89</sup> 陳布雷於1943年12月15日說明增訂版與初版的異同時，曾云：「本書自今年三月十日開始發行以後，印刷至2百餘版。茲經總裁就全書加以校訂，交正中書局重製增訂版。其重要增訂之點：（一）第一章對於中華民族成長之歷史說明有所增益。（二）第三章後段另加一節，附錄今年1月總裁為平等新約訂立告全國軍民之廣播詞，期使我同胞對不平等條約招致之由反省自勵。（三）第五章十年建設表內增加關於農林建設之各項數字。」的說明，參閱蔣介石，《中國之命運》，扉頁。

宗族，本是一個種族和一個體系的分支。」「我們的各宗族，實同為一個民族，亦且為一個體系之一個種族。」<sup>90</sup> 是以，蔣氏在增訂版明確闡述「中華民族同源論」，這可能來自黨政高層的建議，更是與民族同源論在抗戰時期廣泛流傳有關。<sup>91</sup> 學者則認為：蔣介石有意模仿西歐模式，將中國建構成nation-state。<sup>92</sup>

## 二、現代國民

《中國之命運》闡釋中華民族同源後，蔣氏進一步說明「現代國民」的意義與責任，他說：「中國今後的命運，皆在我們現代這一輩國民的雙肩之上。」（頁77）蔣認為：近百年來因不平等條約的壓迫，使得國人在不知不覺之中，做了外國文化的奴隸。（頁70-71）因此，要求國民認識過去的苦痛和艱難，體察今後的責任重大，滌除舊染，積極振奮，不愧為現時代的國民，以適應不平等條約取消後的新機運。（頁74）至於如何成為「現代國民」及其責任為何？蔣介石又說：「國民如不能竭盡其對國家的任務，則國家無由建立，民族無法生存，面對於世界問題，更無從過問，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頁132）「我們必須本於中國六藝教育的精義，以自衛的實力和求生的本能，訓練國民，使每一國民，都能致力於生產，獻身於國防，手腦並用，智德兼修，一改過去萎靡文弱虛偽浮誇的弊病。」（頁136）至於，現代國民該如何致力於今後建設中國的工作，蔣介石分別提出心理建設、倫理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等5方面，要求「成年國民，應各就其職業與地位，把握此中一個重點，以推進其業務。青年國民，應當各就其學業與志趣，選擇此中一個方向，以發展其能力。」（頁137）其中，社會建設方面，蔣介石提到：「新生活運動是社會建設的基本運動，其目的在求中國國民之『現代化』。國民惟有現代化，才配做獨立自由的國民。國民能做獨立自由的國民，國家才能成為獨立自由的國家。」（頁142）

---

<sup>90</sup> 蔣介石，《中國之命運》，頁2、9。

<sup>91</sup> 徐永昌曾針對《中國之命運》初版中有關「中華民族成長與發達」內容，向蔣介石提出修改建議。參閱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7冊，頁57；婁貴品，〈陶希聖與《中國之命運》中的「中華民族」論述〉，頁68-70。

<sup>92</sup> 吳啟訥，〈中華民族宗族論與中華民國的邊疆自治實踐〉，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第1冊：領袖的淬鍊，頁180。

「總之，中國的命運，決定於中國國民本身是不是能夠自立自強，以達成抗戰建國的使命。」（頁183）由上述可知，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不斷強調「現代國民」的意義與責任，亦即蔣氏欲透過此書來形塑「現代國民」，俾以戰後承擔從事建設國家的重責大任。

### 三、國家統一

1928年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後，身為國家領導人的蔣介石，即反對地方軍人割據，重視國家的真正統一；對於抗戰前地方軍人的異動，蔣氏閱讀《聖武記》、《清代通史》等書，期望效法清康熙平定三藩的經驗。<sup>93</sup> 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蔣介石也以「國家統一」遊說張學良支持南京，「國家統一」是蔣介石對於地方軍人異動時的底限，<sup>94</sup> 也是他一直堅持的信念，因此蔣介石對於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提出嚴厲的批評，《中國之命運》云：

至於所謂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則不外英、美思想與蘇聯思想的抄襲和附會。這樣抄襲附會的學說和政論，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其結果他們的效用，不過使中國的文化陷溺於支離破碎的風氣。這種風氣既已構成，於是曲解自由主義和濫用共產主義的學系政派，或明目張膽，或旁敲側擊，或有意，或無意，以某一外國的立場為立場，以某一外國的利益為利益，甚至為帝國主義作粉飾，為侵略主義作爪牙，幾乎忘其所本，亦不知其所學何為和所為何事。<sup>95</sup>

對於組織邊區政府的中國共產黨，蔣介石指責其為「變相軍閥和新式封建」。<sup>96</sup>

<sup>93</sup> 蔣介石於1928年底至1929年初，最常閱讀的書籍是《聖武記》、《清代通史》等書，曾說：「前清對於藩鎮與封建制，似較歷朝為勝。觀於此（《聖武記》）可知立國之難與駕馭之難，足為鑑戒！」參閱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學記》，頁19、20、25。

<sup>94</sup> 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臺北：國史館，2002年），頁145-146。

<sup>95</sup> 蔣介石，《中國之命運》，頁72-73。

<sup>96</sup> 根據《事略稿本》1943年1月25日記載，公曰：「本日增補文稿指斥共黨為變相軍閥與新

《中國之命運》中則有較為詳細的說明：「在現在這個軍政和訓政時期之中，無論用何種名義，或何種策略，而來組織武力，割據地方，企圖破壞抗戰，妨礙統一，這種行動，不是軍閥，至少亦不能不說是封建。這種變相的軍閥和新式封建，究竟對民族，對革命是不是有益，還是有害？大家痛斥從前把持軍隊、割據地方的軍閥是反革命，難道這樣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就是真革命！如果這樣武力割據，和封建軍閥的反革命勢力存留一日，國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軌道。」（頁208）又說：「為什麼我們國內的黨派，倒反而不肯放棄他武力割據的惡習，滌蕩他封建軍閥的觀念，那還能算是一個中國的國民？更如何說得上是『政黨』？」（頁208-209）

《中國之命運》初版發行之後，此段「變相軍閥和新式封建」的論述，引發中共強烈的反擊，蔣介石的反應是：「看完共匪批評《中國之命運》反動小冊，更覺此書對國民教育之重要。惟此足以消除共匪禍國之思想，所以共匪非竭其全力以謀抵消，則其不圖存也。」<sup>97</sup>「至此，匪因此反動，則此書作用已生效果，以余意本在此也。」<sup>98</sup>足見，蔣介石從1928年成為國家領導人後，一直無法達成國家真正的統一，因為抗戰的緣故使得地方實力派軍人已經相繼中央化，只剩下組織邊區政府的中共影響國家統一。是以，蔣介石在1943年中國國際地位達到最高峰，也是個人威望最頂峰之際，已經在思考戰後如何達成真正的國家統一。

#### 四、領土完整

《中國之命運》主要是因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寫，全書內容也環繞著不平等條約，應無疑義。蔣介石在書中多次提到：「今日中國獨立自由的地位，已隨不平等條約的撤廢而獲得。」（頁222）但是，中國並沒有因為簽訂平等新約，而達成領土完整的目標。蔣氏說：「吾人對於此次新約之成立，所不無遺憾者，就是九龍租借地本為我國領土，而英國未能將此問題在新約內同時解決，實為中、

---

式封建一段時誠精思入神，此文非自撰，任何人所不能深入此境也。」參閱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1冊，頁368。

<sup>97</sup>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5冊，頁82。

<sup>98</sup>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學記》，頁309。

英兩國間美中不足之缺點。」（頁128）事實上，在中英平等新約簽訂時，蔣介石曾經強烈主張同時解決九龍租借地和西藏問題，甚至考慮戰後「用軍事力量由日軍手中取回」。<sup>99</sup> 後來，在駐英大使顧維鈞的勸告下，蔣氏才勉強接受英國的方案，而順利簽訂新約。<sup>100</sup> 其在1942年12月的反省錄中記下：「對英外交頗費心神，以九龍交還問題，英堅不願在新約內同時解決，余暫忍之，此時為對英政策與技術一大變也。」<sup>101</sup> 不過，無法順利收回九龍租借地，仍然讓蔣介石耿耿於懷，1943年1月18日，蔣氏曾致電人在紐約的蔣宋美齡，表示：「英國與我所訂新約不肯提及歸還九龍租借地事，實為遺憾！」<sup>102</sup> 可見，蔣氏多麼在意九龍租借地的歸還問題，此時正在書寫《中國之命運》的蔣介石，就透過此書來抒發他對領土完整的期待。

《中國之命運》云：「以國防的需要而論，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統，如有一個區域受外族的占據，則全民族全國家，即失其自衛上天然的屏障。河淮江漢之間，無一處可以作鞏固的邊防，所以臺灣、澎湖、東北四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這些地方的割裂，即為中國國防的撤除。更由立國的資源來說，東北的煤鐵與農產，西北的馬匹與羊毛，東南的鋼鐵，西南的鎢錫，無一種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素。這些資源的喪失，亦即為國基的毀損。」（頁6-7）又說：「帝國主義者除以各種威脅和利誘的手段，勾結軍閥取得特權之外，其他直接干涉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尤以邊疆問題為最著。外蒙古受帝俄的操縱，在滿清宣統三年宣布獨立，內外一切實權，都歸俄人掌握。俄國革命之後，蒙人撤銷獨立，實行內向，歸還中國。其時正日寇利用所謂『中日軍事協定』，策動蒙匪和白俄，以窺我外蒙。西藏問題一樣受外來的影響。藏人與川滇的衝突，亦為英人所利用。而英人之操縱達賴，與俄人之利用班禪，事正相同。我在民國元年《軍聲雜誌》中公開的表示：『征撫蒙藏，不可僅視其形勢之難易，狀況之利害，拘泥於戰術之一隅而已。要當深省英俄之現

<sup>99</sup>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1冊，頁478-479、481；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2冊，頁140。

<sup>100</sup> 陳進金，〈蔣介石對中英新約的態度（1942-1943）〉，《東華人文學報》，第7期（2005年7月），頁141-145。

<sup>101</sup>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2冊，頁152。

<sup>102</sup>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2冊，頁339-340。



況與關係於蒙藏之如何而決定。……當英俄要求干涉之際，吾國雖無力宣戰，亦宜據理力爭，要求其歸還我國主權。……何吾政府計不出此，一再隱忍，甘為退守，喪權辱國，莫此為甚。』」（頁50）《中國之命運》上述的論述，雖曾引起英國的不滿，卻代表蔣氏對於領土完整的堅持。

## 五、平等外交

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中，關於未來中國的對外關係也有所陳述，他說：「我們中國所受於民族壓迫的痛苦最久最深。所以我們中國要求民族自由與國家平等，亦最急最切。」（頁216）因此，「民族自由與國家平等的原則，更當適用於戰後世界經濟與文化的復興和發展。」（頁218）早在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就有「東亞事，應歸東亞人自決；中國事，亦應歸中國人自決」<sup>103</sup>的主張。基於此，蔣介石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倡導所謂『大日本主義』，與納粹主義者所謂『日耳曼種族優越論』同為破壞世界和平的思想。自今以後，文化優越、種族優越的理論必須永絕於世界，世界和平始可以保持不敝。」（頁218）至於，中國自立自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後，更不會有「領導亞洲」的思想和行為；「中國求自由、求獨立、求進步、求發展，其目的在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更在與世界各國共同擔負世界和平與人類自由解放的責任。」（頁216-217）由上述可知，蔣介石透過《中國之命運》一書來闡述，戰後的國際和平組織，應以民族自由與國家平等為原則，世界永久和平才有堅實的保證。

## 六、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

1943年3月，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時，即預估兩年內戰爭即將結束。<sup>104</sup> 因此，蔣氏透過此書進一步來告訴國人，兩年後的中國該何去何從？蔣

---

<sup>103</sup>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愛記》（臺北：國史館，2011年），頁117。

<sup>104</sup> 蔣介石說：「預計世界戰爭的結束，不能延至二年以後，而今年的一年即為戰局的決定關頭。」參閱蔣介石，《中國之命運》，頁182。

認為：「為國家獨立，為民族自由，為雪恥，為圖強，為使後世子孫不淪入奴隸牛馬的悲運，那就應該要共同一致的集中於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之中，來完成我們國民的責任和義務。」（頁203）蔣氏甚至以中國共產黨的〈共赴國難宣言〉的4項承諾，來「證明惟有三民主義為匯萃我整個民族意識的思想，更可以證明中國國民黨為代表我全體國民的要求，和各階級國民的利益而組織，為革命的惟一政黨。任何思想離開了三民主義，即不能長存於民族意識之中。所以抗戰的最高指導原則，惟有三民主義，革命的最高指導組織，惟有中國國民黨。我們可以說，沒有三民主義就沒有抗戰，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革命。」（頁112-113）基於此，蔣介石進一步提到：「抗戰發動之後，我就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以適應全國青年迫切的需要，而開創了中國國民黨的新生命，和中華民族新動力的根源。」蔣又說：「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乃是實行革命建國的總指揮部。成年的國民須加入國民黨，青年的國民只有加入青年團，才可以顧全民族全體的幸福，保障國家整個的利益，策畫國家民族永久的安危。」（頁199）蔣氏最後強調：「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

上述蔣介石「民族同源論」的主張，實異於孫中山的「五族共和說」；<sup>105</sup>有關「現代國民」主張與五大建設說與孫中山主張相近，所差異者為蔣氏已經可以具體規劃時程。有關國家主權與平等的理念，包括國家統一、領土完整與平等外交等，則與〈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sup>106</sup>中之對外政策相似，亦可視為孫中山遺教。不過，孫中山只是單純主張爭取國家主權平等，蔣介石則進一步闡釋戰後中國所應肩負的國際責任，適足以說明1943年的蔣介石對於建構未來的現代中國，充滿著無比的自信。

至於「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內容，則引發了中共的強烈批評，蔣介石對於中共的反彈，有了更明確的論述。1943年8月25日，蔣寫了一篇題為〈最近國內中共與國際蘇俄之動向應做如左之判斷〉的雜錄，文中提到：「共匪

---

<sup>105</sup> 有關蔣介石宣示繼承孫中山的民族思想，及其主張中國各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國際地位平等的相關論述與分析。可參閱吳啟訥，〈中華民族宗族論與中華民國的邊疆自治實踐〉，頁177-182。

<sup>106</sup>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69輯：中國國民黨宣言集》（臺北：編者，1976年），頁92。

對余《中國之命運》第七章，最近乃露骨攻訐，蓋彼以為余決心在此二年之內必欲解決其事也。此為本書重要之點，即試驗共匪對其政治軍事有否拋棄其割據之局勢，而可以政治方法和平解決之意。今其態度已畢露，對於政治方法之解決完全絕望，乃不得不準備軍事積極進剿，此乃本書所發生之又一效用也。」<sup>107</sup> 對於該如何解決中共，蔣介石認為：「中共問題無根本消滅之法，但不能不有解決之方案，如果始終要用十軍以上兵力防制陝北匪區，則不如先搗毀其延安巢穴，使之變成流寇無立足之地為上策。」<sup>108</sup> 蔣介石並且擬定對付中共的步驟，表示：「總之，共匪根據地之延安，必須於德俄戰爭未了之前，與倭俄未確切妥協之時，更須於我對倭總反攻之前，從事肅清為要，過此則無此良機。」<sup>109</sup> 由上述可知，對於2年後世界大戰結束的中國，蔣介石透過《中國之命運》宣示：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同時，擬定了解決中國共產黨的步驟與策略。

## 伍、結論

1943年3月，蔣介石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以往學界總認為陶希聖是該書的代筆者，但透過該書出版經緯和陶希聖的回憶可知，《中國之命運》一書的綱要、概念與內容皆以蔣介石意見為主，故該書仍應視為蔣氏理念的呈現。其次，《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後，引發了黨內、外的檢討與批評，國民黨黨政高層咸認該書有關不平等條約的描述，將損及戰時盟邦的情誼，不利於戰時中國的對外關係。而更大的反彈則來自中共，在該書出版4個月之後，毛澤東親自組織了一場批判行動，把《中國之命運》視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傳書」，並攻擊蔣介石是「中國的法西斯」。事實上，中共認為此書「掀起第三波反共高潮」，不僅稍嫌誇大，也高估當時中共的地位與影響力。

中共中央攻擊蔣的真正原因是：必須淡化蔣介石（中國國民黨）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連結，強調這是全中華民族共同努力所致的結果；是以，將1943年的中國

---

<sup>107</sup>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4冊，頁387。

<sup>108</sup>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4冊，頁378。

<sup>109</sup>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4冊，頁381-382。

焦點集中於《中國之命運》，並擴大對蔣介石的攻擊行動，有助於削弱蔣介石（中國國民黨）在廢除不平等條約方面的貢獻。至於，中共延宕4個月之後才展開攻擊，則與當時國內外情勢的發展有關，包括共產國際的解散、中共延安的整風運動，以及蘇聯對華政策的改變等。

再者，吾人更應把《中國之命運》一書放在蔣介石建構現代中國的脈絡中觀察，透過《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分析，可以理解蔣介石嘗試為戰後的中國擘劃一個藍圖。蔣介石所欲建構的現代中國，其重要元素包括民族同源、現代國民、國家統一、領土完整與平等外交等；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宣示：「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這種延續「國民黨訓政」的政治理念，等於提前2年引發國共政權的爭奪戰，而且這樣國共爭權的戲碼一直延續到戰後。

總之，就國際外交而言，1943年是中國抗日戰爭極具關鍵的一年，蔣介石選擇在此重要時刻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且蔣氏已經預先瞭解到此書將引起英國和中共的反響；但是，蔣介石仍執意出版該書，這並非蔣氏的意氣之爭，而是有其重要政治理念的闡揚。換言之，蔣介石在領導中國堅忍抗戰5、6年之後，終於得以簽署「聯合國宣言」、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出席開羅會議，適於中國國際地位與蔣介石個人聲望達到最頂峰之際，蔣氏欲藉《中國之命運》一書試圖建構現代中國。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 《國民政府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中國之命運》研討〉。
- 《資源委員會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中國之命運讀後心得及研討報告〉。
-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中國命運」之研討〉。  
〈中共詭謀與異動（二）〉。  
〈共匪禍國增編（八）〉。  
〈交擬稿件—民國三十二年一月至民國三十二年三月〉。  
〈交擬稿件—民國三十二年四月至民國三十二年七月〉。  
〈抗戰時期（五十一）〉。  
〈國共協商（二）〉。

### 二、史料彙編

-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69輯：中國國民黨宣言集》。臺北：編者，1976年。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80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二）》。臺北：編者，1979年。
-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1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
-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2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
-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3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
-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4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

-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5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愛記》。臺北：國史館，2011年。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學記》。臺北：國史館，2011年。

### 三、日記、回憶錄

-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何成濬，《何成濬將軍戰時日記》，上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7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陶希聖，《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4年。  
陶希聖口述，陳存恭、蘇啟明、劉妮玲訪問，陳存恭、尹文泉總整理，《陶希聖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國訪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  
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下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

### 四、報紙

- 《解放日報》，延安，1942-1943年。

### 五、專書

- 王泰棟，《陳布雷日記解讀：找尋真實的陳布雷》。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  
張憲文、方慶秋主編，《蔣介石評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陳伯達等，《評《中國之命運》》。張家口：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1945年。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  
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臺北：國史館，2002年。  
費正清（J. K. Fairbank）著，陸蕙勤等譯，《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年。  
費正清（J. K. Fairbank）著，張理京譯，《美國與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9年。

湯應武主編，《黃埔軍校研究》，第4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下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蔣介石，《中國之命運》。臺北：正中書局，1952年。

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六、專文、期刊論文

王震邦，〈蔣及幕僚日記中的《中國之命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國際學術討論會」，2013年11月1-3日。

李楊，〈陶希聖與《中國之命運》的歷史與解讀〉，收入湯應武主編，《黃埔軍校研究》，第4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

李楊，〈陶希聖與《中國之命運》新解〉，《中國社會導刊》，2008年第13期。

李楊，〈蔣介石與《中國之命運》〉，《開放時代》，2008年第6期。

沈寧，〈我的外祖父為蔣介石執筆《中國之命運》〉，《文史博覽》，2009年第9期。

吳啟訥，〈中華民族宗族論與中華民國的邊疆自治實踐〉，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第1冊：領袖的淬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

婁貴品，〈陶希聖與《中國之命運》中的「中華民族」論述〉，《二十一世紀》，總131期（2012年6月）。

張瑞德，〈侍從室與戰時國民政府的宣傳工作（1937-1945）〉，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第2冊：變局與肆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

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收入陳伯達等著，《評《中國之命運》》。張家口：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1945年。

陳進金，〈蔣介石對中英新約的態度（1942-1943）〉，《東華人文學報》，第7

期（2005年7月）。

陳進金，〈蔣介石的國家觀與實踐（1928-1937）〉，《民國研究》，總17輯（2010年5月）。

劉會軍，〈《中國之命運》論析〉，《史學集刊》，1994年第3期。

鄧野，〈蔣介石關於「中國之命運」的命題與國共的兩個口號〉，《歷史研究》，2008年第4期。

楊天石，〈第三國際的解散與蔣介石「閃擊」延安計畫的撤銷——論「第三次反共高潮」並未成「潮」〉，收入氏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下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潘光哲，〈郭沫若與〈甲申三百年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12月）。